

清代粤盐销滇研究

丁 琼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昆明 650091)

摘 要:清代云南由于盐产地分布不均、移民人口增加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原因,食盐产不敷销,于是借销邻盐,粤盐即其中一种。清代,粤盐在滇省的行销可谓贯穿始终,其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区域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期间,更是出现了近乎以货易货贸易形式的铜盐互易。粤盐销滇,尤其“铜盐互易”在滇、粤两省的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足以及广东余盐积压问题,加强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沿途地区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清代;粤盐;云南;铜盐互易;省际贸易

中图分类号:F129;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2)01-0047-05

清代,粤盐在云南的销售可以说贯穿始终,期间又经历了铜盐互易这种近似以货易货的贸易形式,这在整个清代都很少见。粤盐销滇作为 1 种大规模的省际贸易形式,其运销涉及粤、桂、滇 3 省,对沿途及产销地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滇、粤 2 省盐业生产以及清代云南与两广贸易往来的一些情况,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国盐业史及省际贸易的研究。

一、清代粤盐销滇的原因

就云南而言,清代全省所产井盐基本能满足本省原有民众需求,但部分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仍出现缺盐的窘况。这种现象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其一,清代云南虽增开许多盐井,但分布极不均衡,正如王守基所说:“滇盐虽供一省之食,富庶以来,实不敷用,且盐井多在迤西、迤南”^{[1]81},亦即云南北部、东部和广大的边境地区几乎不产盐。同时,云南境内缺乏便利的水路运输,贸易往来基本仰仗陆路,且其境内多崇山峻岭,若将滇盐运至边地,路途遥远艰险,运输

成本极高。再加上当时境内的盐商多为小商小贩,资本弱小,更无力承运。如此,便容易造成除产盐地区以外尤其是边地缺盐的情形。

其二,清代大量移民的涌入,拉动了食盐需求,加剧了缺盐的情形。据有关学者统计,嘉庆、道光时期,云南境内各类移民的总数可在 230 万人以上^{[2]168-170},可见移民之多。食盐为计口授食之物,因而大量移民的涌入,拉动了滇省食盐的需求量,于是当食盐的生产速度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时,民众便有吃不到盐的情况,更加剧了缺盐的情形。对此,《滇南新语》亦有认识:“滇处天末,幅员辽阔,而民户日增,食盐岁需三千六百余万。滇产盐者九井,岁止三千五百余万,尚不敷九十多万斤,沿边诸处每有淡食之苦。”

为增加盐产量、解决民食,云南地方官员不断在产盐丰旺的地区开发新的盐井,但缺盐的情况仍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根据《清史稿》卷 123 的记载,清代全国共 13 个产盐区——蒙古、新疆、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河东、陕甘。其中广东由于境内海岸线漫长,濒海之地大都产盐。到了清代,出

收稿日期:2011-12-23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青年课题(YWHQ11-02)、重点项目(YWHZB06-01);云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2011Y124)

作者简介:丁琼(1985-),女,湖南溆浦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南经济史。

网络出版时间:2012-1-6 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51.1676.C.20120106.1745.001.html>

现“粤东沿海二千余里,人民大半以鱼盐为业”^①的景象。其时广东所产食盐除供本省食用外,还可外销^①。广东盐区虽离云南东南部较远,但与其相邻的广西一向运销粤盐。于是,利用地理上的便近,云南又采取借销邻盐的方式解决民食问题。粤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进入云南的。

二、清代粤盐销滇的概况

清代,粤盐进入云南的运销方式和地区时有变动,相应地,运销量也在不断变动。本文以此为基础,将清代划分为4个时段来探讨粤盐运销云南的具体情况。

(一)乾隆四年(1739)以前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道光《两广盐法志》卷18记载:“滇属广南地方距省甚远,向系听从民贩近粤西者贩买粤盐”;《新纂云南通志》卷149载:“云南广南、开化二府属,距本省各井均远,向由商贩运销粤盐”;《民国盐政史云南分史稿》亦载:“云南广南、开化二府去本省各井远而与广西接壤,向由粤商贩运滇桂交界处,以济民食。”可知,乾隆四年以前,粤盐主要运销滇东南,其具体运销方式为:粤商将食盐运至滇、桂交界处,再由滇商购至广南、开化二府所属地方销售。“私”字则说明了粤盐销滇未取得官方批准,也就是说,粤盐是以私盐的形式进入云南的。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流通于广南府和开化府的食盐既有本省所产井盐,又有粤商私自运销的海盐。至于粤盐入滇的销量及其在滇东南的销售情况等,则因记载的匮乏无从得知。

(二)乾隆四年至乾隆十八年(1739—1753)

乾隆四年,清政府批准粤盐销滇^②,这是清代粤省官盐入滇之始。

从粤盐的运销来看,根据《清会典》卷229的记载,先由广东方面将云南所需食盐运往百色,再由云南买食粤盐的各个地方分别派员前往百色接运,所需白银则从云南司库收存的铜息银内支給。

从粤盐的销区和销量来看,其销区主要在滇东南变化,每年销量在百万斤以上。根据《清盐法志》和道光《两广盐法志》等的记载以及后来云南买食粤盐的情形,乾隆四年所定销滇粤盐为200万斤。乾隆九年(1744)以后,云南新开安丰等盐井,盐产量增加,弥勒、师宗、罗平三州改食滇盐,粤盐改销广南、开化二府及宝宁县三处(开化府文山县仍食滇盐),每年每处40万斤^③。乾隆十七年(1752),因开化府属地方辽阔,食盐供不应求,而且文山县领销阿陋井盐路途遥远,办运较难,于是文山县将先前领销之13万斤阿陋井盐拨给蒙

自,并在原来采买的粤盐数外每年增买20万斤行销本土^④,亦即云南每年运销粤盐140万斤。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粤盐是以官运官销的形式进入云南的,其具体的销售区域虽有变化,但不超出广南、开化2府及其所属地区,其运销量则经历了先减后增的变化。

(三)乾隆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1754—1839年):铜盐互易时期^⑤

乾隆十九年(1754),清政府同意滇、粤两省铜盐互易^⑥。这是一种近乎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⑦,具体内容为:以广东的盐与云南的铜进行交换,再将铜与盐的差价补给云南。自此直至铜盐互易结束,粤盐均以这种方式进入云南,但其具体的运销方式、运销区域及运销量仍有变动。

从运销方式来看,经历了由官运到商运的变化。铜盐互易最初定为“两省按年轮值”,即由滇、粤两省按年“轮班”负责铜盐运输事宜^⑧。嘉庆十七年(1812),云贵总督伯麟奏称按年轮值造成诸多不便,于是改为“各办各运”:滇铜由云南派员运至剥隘,再由广东派员接回粤;云南所需粤盐则由广东派人运至百色,将抵百色时知会广南府、宝宁县接运^⑨。嘉庆二十五年(1820),销滇粤盐由官运改为百色埠商带运。道光二十年(1840),铜盐互易停止,粤盐仍由粤商办运。

从运销地区和运销量来看,运销区仍为滇东南地区,而运销量略有变动。乾隆二十三(1758年)以前,云南每年运销粤盐数及其销区与乾隆十七年同。此后,因人口增多,云南添买粤盐30万斤行销广南府弥勒州^⑩。乾隆三十年(1765),云南因“垦地日广,生齿日繁,食盐不敷”,再次增买粤盐50万斤^⑪,至此,粤盐每年有220万斤行销云南。乾隆三十八年(1773),弥勒改食滇盐,其原销之30万斤粤盐拨给广南、宝宁20万斤,文山10万斤。同时,文山县停止销售阿陋井盐,由广南府和宝宁县各拨粤盐10万斤。此外,广南、宝宁再添买30万斤粤盐。总计云南运销粤盐达250万斤^⑫。嘉庆三年(1798),云南运销粤盐数改为200万斤,分拨广南府、宝宁县各55万斤,开化府40万斤,文山县50万斤^⑬。嘉庆十二年(1807),开化府和文山县改食滇盐,广南府和宝宁县仍运销110万斤粤盐^⑭。之后至铜盐互易结束,此数未见变动。

在铜盐互易时期,粤盐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运销云南,其具体运销方式经历了由官运官销到商运官销的变化,销区、销量也经历了前增后减的过程。

(四)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各种

矛盾激发,全国各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即使是地处边陲的云南和两广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粤盐销滇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从粤盐的运销方式来看,由于时局的变动及国外私盐的倾销等因素,粤盐运销方式的变动比较频繁。据《新纂云南通志》卷 152 记载,杜文秀起义期间(1856—1872),云南局势混乱,商运官销之法被废弃,销滇粤盐完全由商人操纵,且不时侵占滇盐销区。光绪三十年(1904),粤盐改为官、商互运。随后,应商人要求,改归商办。不久,商人因达不到政府额定的运销量,又改归政府派员专理。于是,粤盐仍通过官运官销的方式行销云南^④。宣统二年(1910),广南府改销滇盐^④,云南借销粤盐告一段落。

从粤盐的销区和销量来看,宝宁县于光绪、宣统年间改销滇盐^④。因此,这一时期,粤盐主要行销于广南府地方。但实际上,粤盐在云南的销岸又常常被来自越南、缅甸的私盐侵夺^⑩,可见粤盐在滇省的销售并不乐观。史载光绪年间,政府规定广南府每年应运销 250 万斤粤盐,但实际上,粤盐每年的销量却连 200 万斤都达不到^⑪。但清政府为了保障财政收入,仍以额定的 250 万斤作为纳课征税的标准,无疑加剧了商民的负担。

与铜盐互易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广南府仍行销粤盐,宝宁县则于清末改食滇盐。其额定销量由道光年间的 110 万斤增加到光绪、宣统年间的 250 万斤,但由于交、缅私盐的泛滥,其实际销量少于此数。

综上所述,整个清代,由于各种因素,粤盐在滇省的行销,不论运销方式,还是运销量以及销区,均发生了变化(见表 1)。但不论这些因素怎样变化,其运销区域基本不超出滇东南,每次的运销量也基本维持在百万斤以上。

三、粤盐销滇的地位及其影响

粤盐销滇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敷以及广东余盐积压问题,铜盐互易期间又解决了广东鼓铸铜需问题,于国于民均有利。盐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并不局限于盐务本身,粤盐亦如此。清代粤盐销滇的地位和影响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粤盐销滇,在清代云南省际贸易,尤其滇粤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广东输往云南的货物来看,主要有粤盐以及自上海、香港等地转口而来的棉纱、布匹和日用百货等。除粤盐外,其他货物的运销也不在少数,但大多为商人自发行为,在规模上难与粤盐匹敌。据前文所述,乾隆四年至宣统二年,每年运往滇东南的粤盐均达百万斤,足见当时食盐运输规模之大。从云南

表 1 清代历年销滇粤盐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地区的变化表

时间	销区	运销量 (单位:斤)	运销方式	注
乾隆四年 (1739)以前	广南府、开化府	——	私运私销	
乾隆四年(1739)	广南府、弥勒州、 师宗州、罗平州	2000000	官运官销	铜盐互易阶段
乾隆九年(1744)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	1200000		
乾隆十七年(1752)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文山县	1400000		
乾隆十九年(1754)				
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文山县、 弥勒州	1700000		
乾隆三十年(1765)		2200000		
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广南府、开化府、 宝宁县、文山县	2500000		
嘉庆三年(1798)		2000000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广南府、宝宁县	1100000		
道光二十年(1840)				
咸丰六年(1856)	——	——	商运商销	
光绪三十年至宣统 二年(1904—1910)	广南府	2500000	官商互运到商 运商销再到官 运官销	

输往广东的商品来看,铜矿的运输亦属大宗。《新纂云南通志》卷 155 记载:“云南之大宗输出口,厥为铜矿……岁供京、滇铸钱及八路采办之需。”根据《清盐法志》及道光《两广盐法志》等的记载,铜盐互易期间,云南每年运往广东的铜矿均在 10 万斤以上。这个数字虽在整个滇铜外运的比例中所占份额较少,但在滇、粤两省的贸易中已属大宗。因此,铜盐互易可谓囊括了滇、粤两省贸易往来的大宗商品,其规模和地位自不可小觑。

近代以后,随着铜矿的衰落,锡矿的兴起以及云南通商口岸的开放,云南输往广东的大宗商品转为锡矿,由广东输往云南的大宗商品则主要为棉纱、棉织匹头、毛织品等^⑫。

第二,促进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联系。明清时期,尤自明代中叶,广东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广西、云南相对落后。因而,在 3 省的贸易中,粤商尤显活跃。同时,由于粤盐和滇铜的往来,滇桂通道沿线地区到处可见粤商的踪迹。梧州府下辖的苍梧县戎圩:“客于戎者,四方接鞞,而莫盛于广人”。^{⑭876}从记载来看,当时广西苍梧戎圩已是十分繁华的货物集散地,其繁华与广东商人的商业互动密不可分。嘉庆时任浙江知县的郭文铤《运铜过富州》一诗也谈到粤商往来富州的情形:“贾舶来从粤,邮程达自滇。……岂有奇珍贩,多将土物传。”^⑮富州即今富宁县,是云南通往广西、广东的东大门。不难看出,粤商的往来为滇、粤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辗转于滇桂通道上运输粤盐的商人,不仅仅为滇省民人带来了食盐,而且带来了粮食、布匹

及其他日用品等,回程时则购置了云南及沿途地区的铜、锡、钨等矿产品及土特产,进一步促进了云南与两广的经贸来往。

经营于滇、桂两地的两广商人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了商帮,还在一些地区建立了会馆。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东商帮在百色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粤东会馆^[5187]。光绪三年(1877),两广商帮在昆明建立了两粤会馆^①。据《铁路公司全宗》的记录,光绪三十二年(1906)参加云南省商务总会的59个商帮中有3个来自两广,分别是广帮、广西土药杂货客铺以及广东土药杂货客帮^[6163]。商帮和会馆的形成说明粤商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商人们利用便利的水路运输,以会馆为连接中心,建立起地跨滇、粤、桂的商业网络,对于促进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促进了滇桂通道沿线城镇的发展。清代,销滇粤盐作为一种远距离、大规模的过境贸易,对所经地区的城镇、市场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板蚌,位于今广南县城东74公里处,素来瘴疔横行,因而曾有“若要下板蚌,先把灵牌供”^[7126]的说法。乾隆初年,因有河流舟楫之便,板蚌建立了码头^[8934],成为水路交通要道。(道光)《广南府志》卷1《山川》记载:“板蚌河,……河势宽阔,水如碧玉,岛樯风帆,出没掩映,宝宁行销粤盐及各省采铜俱道于此。”随着粤盐、滇铜的流通,板蚌吸引了各方商人,形成了各种物资交流和各省商贾云集的商业集镇。又如,剥隘,位于今富宁县东北部,东接广西百色,北连广西田林。清代粤盐正是以剥隘为中转站源源不断地进入滇东南。剥隘本为滇东南通往广西的重要门户,而铜、盐的流通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剥隘乃至整个富宁的贸易规模,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嘉庆十六年(1811),清政府在剥隘北面西洋江建立了博爱大码头^[8439-440],码头的建立说明当时剥隘的商贸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再如,百色,地处广西右江流域的中心,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汇处,史载“下达南宁,汇于郁水,铜运、盐运与夫东道行商帆樯时集别派”^②。清代,百色作为滇桂通道的重要中转站,不仅粤盐、滇铜在此中转,还有其他许多货物的流转也通过此地。频繁的商贸往来,有力地促进了百色的城镇发展。到了光绪年间,百色“城厢外,市肆喧闹,舟载马驮,百货云集,类皆来自东粤以及滇、黔,非土产也”^③,其繁华景象可见一斑。

板蚌、剥隘和百色等均为滇桂通道上的重要城镇,也是粤盐运输必经之地。其中,剥隘和百色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盐、铜的中转站,在粤盐销滇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3个城镇兴起和发展

的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到交通运输及过境贸易对城镇发展的重要意义。

市场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根据刘云明、龙登高、王福明等人的研究,近代以前,云南统一的区域市场尚未形成,仍然是一个由各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地方市场组成的集合体^[619-101]。《泰晤士报》首任驻华记者柯乐洪1869年经调查后说到:“云南的地形如此复杂,没有一条商路能包揽该省贸易。”落后的运输方式,使“所有可能到达昆明的道路都漫长、艰险、昂贵,只能或大或小地供应云南某一区划,而与其他地区无缘。云南高原各部由最靠近的周边低地供应商货。四川货在相当贫穷的滇东北、滇北及黔北流通;百色供应滇东、滇中及黔南;东京(在今越南)与滇南、滇中联系;缅甸与滇西南和滇南贸易。从商业角度看,这大约是该省最理想的贸易对象了。”^[672]正如柯氏所说,滇东南地区由于地缘的关系以及滇桂通道的存在,一向与两广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清代,粤盐销滇的开展不仅为滇东南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资源,而且进一步密切了滇、桂、粤3省的经济联系,因为商人在将食盐运至百色、剥隘等地的同时,也将布匹、粮食等商品运至这些地区,而且在回程时还收购了云南及沿途地区的矿产品及土特产等,并将其销往其他地方。而后,随着“铜盐互易”的开展,则进一步促进了两广与滇东南乃至云南的经济交往。

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为全国商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全国商品流通网络已经形成,商业交通四通八达,大大便利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11]。清代,粤盐销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展的。其在云南的运销几乎贯穿始终,并且以铜盐互易的形式进行了近百年。在这种跨越滇、桂、粤3省的远距离的大宗商品贸易中,滇桂通道这条交通路线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沟通了滇、桂、粤3省,为粤盐和滇铜的顺利流通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盐、铜在这条通道上的大规模流通,不仅对保持滇桂通道的顺畅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为其经过的沿线地区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滇桂通道正是联系滇、粤、桂3省商品流通的主要通道,并与全国其他通道组成了全国商品流通网络。近代交通尚未兴起以前,滇桂通道的存在,使云南得以同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不同地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从而加快了云南融入全国统一市场的步伐。

注释:

①(清)阮元等修撰.道光两广盐法志[O]:卷22,道光十五

年刻本。

②(清)阮元等修撰.道光两广盐法志[O]:卷 18,道光十五年刻本。

③(清)周庆云.盐法通志[O]:卷 65,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④(民国)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O]:卷 149,1949 年云南省通志馆据 1944 年刻本重印。

⑤关于铜盐互易的起始时间,史书上有乾隆十九年(1754 年)和嘉庆十七年(1812 年)之说.根据黄国信的考证应为前者(黄国信.清代滇粤铜盐互易略论[J].盐业史研究,1996,(3)).而关于“铜盐互易”结束的具体时间,史书上也有两种说法:道光二十年〔清〕王守基.盐法议略:云南[O].//丛书集成初编:0774[O].北京:中华书局,1991:81)和道光二十五年(阮元等修纂.道光两广盐法志[O]:卷 18).王守基生于嘉庆后期,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曾担任云南司郎中,对云南政务比较了解.且根据严中平的研究,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云南铜运无法外运(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43).据此,笔者采取王守基的说法。

⑥(民国)盐务署纂辑.清盐法志[O]:卷 218,盐务署,1920。

⑦(民国)盐务署纂辑.清盐法志[O]:卷 277,盐务署,1920。

⑧(清)阮元等修纂.道光云南通志稿[O]:卷 72,道光十五年刻本。

⑨(民国)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O]:卷 147,1949 年云南省通志馆据 1944 年刻本重印。

⑩(清)嵇璜等奉敕撰.清朝文献通考[O]:卷 40,上海: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

⑪(民国)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O]:卷 152,1949 年云南省通志馆据 1944 年刻本重印。

⑫(民国)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O]:卷 144,1949 年云南省通志馆据 1944 年刻本重印。

⑬(清)李熙龄等修纂.道光广南府志[O]:卷 4,道光二十八年重刻本。

⑭(清)岑毓英等修纂.光绪云南通志[O]:卷 94,光绪二十年刻本。

⑮(清)陈金如.光绪百色厅志[O]:卷 3,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年 5 月据光绪十七年(1891 年)刊本影印。

参考文献:

- [1] (清)王守基.盐法议略:云南[O].//丛书集成初编:0774.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 6 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3] 黄国信.清代滇粤“铜盐互易”略论[J].盐业史研究,1996,(3): 4-8.
- [4] 重建戎圩会馆记[M]//苍梧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苍梧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 [5] 创建粤东会馆序[M]//吴小凤.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6] 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 [7] 陆烈武.昔日板蚌的水陆交通[M]//广南县文史资料选集:第 4 辑.广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广南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
- [8] 龙王庙碑文[M]//黄懿陆.壮族文化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9]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508.
- [10] 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2):101-123.
- [11] 邓亦兵.清代前期全国商贸网络形成[J].浙江学刊,2010,(4):15-25.

责任编辑:梁 雁

A Study on Salt Sales from Guangdong to Yunnan in the Qing Dynasty

DING Qiong

(Humanities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alt, increasing immigrants and backward traffic, Yunnan was lack of salt and needed to purchase salt from neighboring provinces in the Qing Dynasty. Guangdong salt was one of the sources. Salt had been sold from Guangdong to Yunnan throughout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in its modes, areas and quant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Once, there had appeared copper-for-salt transaction, a kind of barter trades. This trad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inter-provincial tr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t assuaged the insufficient salt in southeast Yunnan and the overstocking of salt in Guangdong; it also strengthened the economic ties between Yunnan and Guangdong and Guangxi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own and economy along the salt sales route.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Guangdong salt; Yunnan; copper-for-salt transaction; provincial trade